

理解 中国 社会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张海东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理解
中国
社会

张海东 / 主编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序 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有形”变化，也包括隐藏于人们内心中的“中国体验”（周晓虹等，2017）变迁。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都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这些变化进行了解读，并且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我国特有的现象，很难根据已有的理论进行分析。“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差异”（李培林，2017）。实质上，这些独特的现象都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的多维二元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多维二元结构是指我国社会由一系列二元结构及其相互交织作用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张海东，2018）。这种多维二元结构不仅使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多元化，催生了新社会阶层、农民工等很难根据现有社会分层理论进行解释的社会群体，而且导致区域以及城乡间的社会现代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更体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上。此外，多维二元结构也使原有的单位体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式微，从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例如，不同部门和户籍群体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明显差异，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由于没有被整合到已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而相对缺乏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等等。

“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不同类型个人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职业生涯都是有意义的，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米尔斯，2005）。根据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系统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所处的社会，理解个人的生活机遇和

生命历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从2012年开始在上海大学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选修课程——“理解中国社会”，旨在通过“授之以渔”的方式帮助在校大学生更好地掌握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理论框架，认识中国社会的特征，了解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如何与社会整体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解中国社会”课程是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共同讲授的，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和积累，课程的内容安排与设计已经大致成熟，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理解中国社会》一书。为了系统地认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和问题，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由社会结构、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三个维度的内容构成的理解中国社会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是以多维二元结构为基础展开的，着重突出了多维二元结构给当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全书由三编八章的内容构成。

第一编“社会结构”主要分析多维二元结构给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显著影响。从社会结构看，多维二元结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多维二元结构还催生了新社会阶层、农民工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社会群体。第二编“社会问题”由三章的内容构成，主要分析的是多元二维结构下社会治理领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数量所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但是，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这既为“夕阳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如何进一步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基层社会治理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体制之间是相对应的，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才能建立起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格局。第三编“社会生活”由两章内容构成，主要分析的是多维二元结构下家庭结构和社会信任发生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家庭类型日益变得多样化，核心家庭的数量快速增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与家庭结构变化同样显著的是，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逐步走向平等。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还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但是不同人享受到的“数字红利”有着明显的差异。此外，社会的信任机制也在发生急剧变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信任是“熟人信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脱域”（吉登斯，2011）现象，传统社会的熟人信任机制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现代的社会信任机制却没有形成，因而“杀熟”等问题随之出现，这也要求从传统的特殊信任向现代的一般信任转变。

本书的分工如下：第一章，张海东、杨城晨；第二章，张海东、杜平；第三章，贾文娟；第四章，李贞；第五章，黄苏萍、苗瑞；第六章，汪丹；第七章，陈蒙；第八章，谢宝婷、袁浩、王菁玥。

参考文献

- 吉登斯，2011，《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 李培林，2017，《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6期。
- 米尔斯，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张海东，2018，《多维二元结构社会及其转型》，《江海学刊》第4期。
- 周晓虹等，2017，《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海东

目 录

第一编 社会结构

第一章 阶层分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3
第一节 社会阶层分化	3
第二节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13
第三节 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问题	22
第二章 新二元体制社会	30
第一节 单位社会及其特征	31
第二节 新二元体制社会的形成	41
第三节 新二元体制社会的影响	50
第三章 城镇化与农民工问题	57
第一节 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迁移	57
第二节 城市与城镇化	64
第三节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问题	72

第二编 社会问题

第四章 经济新常态下的就业问题	83
第一节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85
第二节 劳动保护与就业	92
第三节 科技发展与就业	101
第五章 老龄化与老龄社会	110
第一节 人口爆炸与人口老龄化	110

第二节	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116
第三节	老龄化研究与老龄社会的影响	125
第四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及启示	132
第五节	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141
第六章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148
第一节	社会组织及现代社会组织体系	149
第二节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158
第三节	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国道路	169

第三编 社会生活

第七章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	187
第一节	转型社会中的家庭结构变迁	188
第二节	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	200
第三节	老龄化、“独居时代”和家庭新风险	209
第八章	中国人的信任与面子	224
第一节	中国人的信任	225
第二节	中国人的面子	236
第三节	信任与面子	240

第一编
社会结构

第一章 阶层分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谚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差别能够通过代际更迭而呈现一定的“遗传性”。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以及网络传播的发展，“富二代”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子女，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公众的眼中，他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成长在父母的光环下，往往开名车、戴名表、住豪宅，无须努力就可以过上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优越生活。而从“富二代”引申出的诸如“贫二代”、“星二代”、“农二代”、“独二代”等称谓，近年来也开始被媒体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这种现象即“二代现象”。“X”二代也就成为描绘社会阶层位置“遗传性”的流行用语。本质上说，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与流动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迅速地分化与重组，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复杂社会。本章主要从我国阶层分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试图解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过程与结果。

第一节 社会阶层分化

一 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测量

(一) 阶级与阶层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人群由于职业、收入、财产等各种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产生的层级分化现象，社会学家将其称作社会分层（李强，

2013)。而社会分层的实质就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层分化。谈到阶层分化，阶级与阶层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概念。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之后的社会学家都对社会中的阶级与阶层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 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中的阶级

卡尔·马克思是社会学三大理论流派之一的奠基人，是经济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大师，他所开创的阶层分析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class）现象被认为是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对阶级这一概念做过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相关著作以及后人的总结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阶级是指占有同样经济地位的群体，尤其是指一个集团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经济因素是马克思判定阶级形成与阶级划分的唯一标准。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划分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三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其中最基本的两大对立者是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1972）。

马克思认为，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必然存在根本对立，这势必导致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正是这种对抗和冲突推动了阶级社会向前发展，并最终导致社会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思想。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由于各个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和斗争，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只有用阶级的观点观察、分析和研究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现象，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的本质。

2. 韦伯多元分层体系中的阶层

作为社会学领域的巨擘，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思想同样在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应当是多元的，在这些多元的标准中，财富、权力与声望占据了主导地位，是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李强，2013：32~33）。财富标准，是指社会成员在市场中的机会，即个人能够占有商品或劳务的能力，也就是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多少；权力标准，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标准指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的声誉或尊敬，取决于个人的身

份、受教育水平以及生活方式等，在多数情况下，声望来自较高的社会地位。在韦伯看来，财富、权力与声望这三者是互相独立的，但有时又是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因此，他主张综合上述标准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划分成不同的阶层（classorstratum）。

虽然韦伯的多元阶层理论同样关注社会差别与社会不平等，但有别于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决定论，韦伯的多元分层观点更强调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因素；而其采用的财富、权力、声望等多元划分标准，更是确认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它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与互相交织的，因此在韦伯主义者看来，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者用来进行研究的一种分类，在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集体意识，这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阶级是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阶级之间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迥然不同。

3. 阶级与阶层概念的辨析

在马克思与韦伯之后，迪尔凯姆（Durkheim）、达伦多夫（Dahrendorf）、吉登斯（Giddens）等社会学家均对阶级与阶层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于阶级或阶层的划分标准纷繁多样，但究其来源，均离不开马克思或韦伯的社会分层思想。在他们的有关论述中，“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采用同一个词“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一般认为，英文中的“class”一词的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中文中的“阶级”与“阶层”这两个词的含义。而“stratum”一词的意思则比较窄，一般指的是等级分化（stratification）造成的连续性的等级排列。在多数人看来，“阶级”这个词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个词还带有反感情绪与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特征的群体概念。两者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词的含义，而在于采用哪种思路来分析。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不去特意区分“阶级”与“阶层”在具体含义上的区别，除有特殊说明的以外，两者可以通用。

（二）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群体对各种资源的占有能力也随之发生改变。社会的变化最终体现为人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的分化

与重组，因此，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构性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放眼世界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化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西方社会，以往由资本家、农场主以及工人、农民构成的简单的阶层结构演化为当今包括企业主、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在内的多样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平均主义”特征明显的社会结构让位于差异日益明显的阶层结构，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步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异也不断扩大。那么，体现这些差异的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是什么？阶层分化的结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分层体系？对于这些问题，吉登斯的阶层结构化理论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市场能力与阶层结构化

在吉登斯的阶层结构化理论中，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提升其讨价还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他认为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对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和对体力劳动的占有。基于这三种不同的市场能力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层——上层阶层、中产阶层和下层工人阶层（Giddens, 1973）。而在市场能力与阶层形成之间，结构化（structuration）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具体来看，相关的结构化主要包括劳动分工、权威关系以及消费能力等直接决定和构造阶层结构的“直接结构化”以及不同的社会流动机制导致阶层再生产的“间接结构化”。吉登斯认为，阶层是一种结构化的现象，它使得阶层内部成员中产生了一种相对类似的态度或信仰，塑造了内部相近且区别于其他阶层的阶层意识。这也就是阶层结构的“二重性”特征。

2.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化的相关特征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及对阶层结构变化的整体判断问题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成为当前社会阶层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中，陆学艺的“层化论”观点、李强针对中国社会的“碎片化”分析以及孙立平的“社会断裂”理论较有代表性。现代化的社会分层结构雏形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阶层要素的建构呈现一种稳定的趋向。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分化、社会地位的分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分化趋于一致，而且这种身份地位趋于稳定化、持续化，我国社会在阶层分化领域呈现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李春玲，2005），这种阶层分化影响着

社会成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阶层分化的测量

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与阶层结构，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准确的测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现实中，学界一般使用数量化、指标化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与社会分化状况。一般来说，当前测量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方法有五等分法、恩格尔系数法以及基尼系数法等。

1. 五等分法

五等分法是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份，然后测量每 20% 的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把人口分为五等，即五分之一最穷的，五分之一次穷的，五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次富的，五分之一最富的，从这五等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来看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化的具体状况。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最高 20% 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7097 元，其后 20% 的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5163 元，中间 20% 的中等收入家庭、次低 20% 的中等偏下家庭以及最低 20% 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3781 元、24550 元和 13723 元。最高 20% 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 20% 的低收入家庭的 5.62 倍。而在农村，最高 20% 的高收入农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299 元，是最低 20% 的低收入农村家庭的 9.48 倍（国家统计局，2018）。而在 2013 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中最高 20% 高收入家庭与最低 20% 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分别为 5.84 倍和 7.55 倍（国家统计局，2018）。这些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家庭收入和贫富不均现象较为突出，少部分人拥有较高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异逐步增大。

2. 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程度提高，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界定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60% 以上为贫困，在

50% ~ 59% 为温饱，在 40% ~ 49% 为小康，在 30% ~ 39% 为富裕，在 30% 以下为最富裕。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 1995 年末下降到 50% 以下，1999 年继续下降到 41.9%，2000 年下降到 40% 以下，达到了富裕水平。2017 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3%。从这一数据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3. 基尼系数法

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 1943 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兹曲线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 0~1 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0 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1 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 100% 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标准，这一系数若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 0.2 ~ 0.3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在 0.3 ~ 0.4 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 0.4 ~ 0.5 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在 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 0.4 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则预示着社会动荡可能发生。

1978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 0.18，属于绝对平均的水平，但到 2000 年已经达到 0.417。2012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为 0.474，已经大幅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分化加剧现象在社会中日益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尼系数可以体现收入分配情况，但无法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果在一个机会相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社会，不同收入群体始终处于动态，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阻力小，低收入群体一般不会有仇富心理，且大多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和希望改善生存境遇，或把自身的低收入作为一种激励；与之相反，在机会不公平、程序相对缺乏正义的社会，收入差距才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

二 对我国社会分化状况的总体判断

40 年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阶层结构方面来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改变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也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这 40 年的

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那种依靠政府权威、行政命令管理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差异不大的“总体性社会”逐渐式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使社会转型不断加速，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分化程度较高的“异质性”社会。在这种异质性社会中，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人们的社会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社会分化也引发了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弱势群体增加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做出总体判断。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分化存在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的竞争氛围，对社会进步也是有益的；若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就会对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从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是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基尼系数为0.18，可以看作“绝对平均社会”，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收入差距较大。

笔者认为，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背后隐含着多元、深层的机制性原因。市场经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与“大锅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城乡之间存在的制度性壁垒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造成了农村发展的滞后，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在职业与行业领域，由于垄断行业缺乏竞争机制，使得行业平均利润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拉大了职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地区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资源配置与政策支持方面的倾斜使得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造成了贫富的地域差异。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我们需要警惕“马太效应”的形成。在社会中，由于富裕阶层自身占据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以及生活技能普遍较高，而贫困者往往由于自身在收入、教育、职业技能等方面处于劣势，可能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问题，给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巨大的隐患。